

干部队伍建设要抓重点求实效

——读邓小平《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 王斌伟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中强调，“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是干部问题”，首次提出干部要“能上能下”，对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干部交流、学习培训进行了系统而有针对性的阐述。讲话的核心内容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的《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讲话坚持问题导向，提出了富有创新性、前瞻性的观点和主张，体现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对执政条件下干部队伍建设的系统思考。

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要逐步解决

新中国成立时，党和政府的绝大部分干部都很年轻。到20世纪60年代，干部年轻化问题、干部退休问题尚不迫切，干部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干部数量已经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军队干部转业、提拔新的干部等“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能下”是唯一出路。我们党长期以来对干部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这有特定历史原因。党执政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干部数量多的问题日益突显，又不能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邓小平指出：“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他提出，首先是思想上要弄通，“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他指出：“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他提出要切实做好“劝说”的工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办法：

“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

基层可先行先试。为稳妥推进干部“能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的思路。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

干部“能下”意义重大。邓小平认为，干部“能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干部数量多的问题，它对干部是一个锻炼。干部“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长远的角度，他强调指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干部能上能下。

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重视党内监督工作，1927年4月党的五大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于1949年11月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强化了监察委员会在党内监督上的职权权限；但就党内监督的形式而言，这一时期党内监督更多采取运动的形式，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这一时期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有针对性地就加强干部监督作了阐述。

干部监督要多渠道进行。邓小平指出，对干部的监督包括党的生活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他特别强调党的生活的监督，指出高级干部要过党的生活，结合讨论工作，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

对于一般党员、干部，则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

干部监督要经常抓，不能单靠运动。邓小平指出：“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从管长远管根本的角度，他强调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鉴定制度恢复起来。

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党的一贯主张。我们党从建党之初就重视干部交流。1943年2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推进干部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干部交流开始走向制度化。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专门谈了干部交流的目的和意义。

干部交流要明确目的。邓小平指出：“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干部交流有很多好处。邓小平站在关心爱护干部、支持干部担当作为的立场，对干部交流的意义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从干部成长角度，他指出：“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他还从干部管理角度提出，对于一些单位和地方干部“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的现象，可通过干部交流的办法来解决，一则“换个地方就可能合得来了”，二则也可以搞清楚合作不好是谁的毛病。

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宝贵的优良传

统和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兴党史，就是一部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学习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因而更加重视干部的学习。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提出要对全党各级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 and 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明确要求，必须贯彻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发扬民主，使干部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落实“三不”要求，即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贯彻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邓小平作这篇讲话时，有的地方已经完成轮训，有的没有完成。邓小平对加强学习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干部学习要经常进行。邓小平指出，干部学习，要学的东西很多，总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高度重视党校在干部培养中的主阵地作用，说“党校不经常办会受到损失。一个时期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变过去变过来”。邓小平说，他赞同党校既搞经常的党校教育，又搞时间短比如“读一读书”或“集中议论一个什么问题”的轮训。

从党内政治生活的高度对待干部学习。干部学习不是一般的知识学习，它是一种自我修炼，其目的是为了纯洁党性、提升境界、焕发精神、增强本领。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干部学习常用、有效的一种方法。邓小平指出：“过去执行‘三不’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只有那个过去挨过批评要出气的人才能出气，而过去批评过别人的人，甚至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只能讲这一方面的，不能讲那一方面的。”对此，他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三不”方针，“说老实话，说错了纠正”。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是邓小平在我们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干部工作的一次系统思考，其蕴含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上接1版）

重大项目建设再立新功。长期以来，国企央企始终是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主力军，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京沪高铁、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既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成为国家名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推进重大科研设施、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重大引调水、防洪减灾、送电输气、沿边沿江沿海交通等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确保优质高效完成这些重大工程建设，国有企业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既要持续发挥主力军作用保证工程建设，又要持续推动行业技术升级提升工程质量。

在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上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加快资源向新兴产业转移。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其中新的科学领域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带动新一轮产业革命不断向前推进，创造出新产业新业态。这要求国有企业以只争朝夕的姿态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主攻方向，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加快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国有企业必须聚集核心资源进行产业布局，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确保国家安全以及具有行业影响力、带动力的重大项目，着力突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行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瞄准前沿领域。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部署和要求，国有企业必须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强化人财物等要素的一体化配置，打造高效科技攻关体系，勇于领敢干领跑，换道超车，构筑发展新优势。

加快进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十四五”时期是全球新型基础设施大建设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综合发展的关键期。国有企业要在传统基础设施基础上积极投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交通、能源、通信、水利、城市等产业深度融合。

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技自立自强上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做科技自立自强的骨干。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国有企业必须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不竭动力。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持续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更加主动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持续发挥国有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着力加大科研投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源头在基础研究。我国要缩小与科技强国的差距，培育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就必须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投入。虽然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取得长足进步，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一方面，科技投入整体比例偏低；另一方面，基础研究投入较低。要培育强大创新能力，必须持续加强科技投入尤其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激发组织和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而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必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一方面，要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倡导国有企业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意识，保护创新成果；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和健全创新系统，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进一步加大企业研发投入，稳步提升研发投入比。另一方面，要调动个人的创新积极性和潜能。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保留、使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提供更加开放的国际高端人才引进和集聚制度与政策，强化激励，用好人才，使发明者、创新者能够合理分享创新收益，从而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和潜能，更充分地满足社会创新需求。

大力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优秀的国有企业企业家需要有“修身、齐家、治企、富天下”的理想情怀，有敢于冒险的勇气，有求新求变的好奇，有追求成功的激情，有争创一流的豪迈气概。还要培育国际视野，思考问题、作出决策要胸怀世界、面向国际，要拓宽眼界，不单要了解本行业、本领域的前沿信息，更要对产业链供应链及其他相关产业、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知与把握。

（作者系中国通号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文学家，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出身名门，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历任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官至首辅。二是早年成名，杨慎24岁殿试夺魁，成为状元。他的家乡新都人常以“升庵科第”与“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并称来称赞他。三是博学多才，杨慎一生所学涉猎极广、渊博浩渺。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总结杨慎的治学之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多闻博见，知不若行

杨慎以学问广博著称，他在哲学、训诂、历史、名物考据、诗词歌赋，乃至天文地理、戏曲音乐、古谣搜集等很多领域都广有建树。杨慎主张做学问首先要多闻博见。我们知道，程朱认为“德性之知”是“大知”，“见闻之知”是“小知”，陆王也主张良知“不假见闻”而有，要求发明本心，从而贬低了见闻之知的重要性。杨慎则认为“耳目之官，聪明依寄；百度万物，悉在见闻”，所以他主张“闻不若见”“知不若行”。杨慎重视亲身见闻和力行，认为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当然杨慎并未否定间接经验，他认为认识有其过程，感性经验必须“会之于心”，才能超乎声色，从现象深入本质。但是如果一定要在逻辑上分出一个先后，那么杨慎主张“知不若行”，他认为



像书本知识等间接经验必须“体之于身”才能化为“真知”。针对当时陆王心学空谈心性的风气，他提出“合博约论”，主张做学问要以“多闻博见”为根基，先博后约，由博而反约，最后合博约为一。他说：“无文则何以礼？无博则何以约为？”又说：“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是犹问天曰：何不径为雨，奚为云之扰扰也？问地曰：何不径为实，奚为花之纷纷也？”

杨慎重视力行、提倡多闻博见，这种治学特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如果按照常理常情不出意外的话，状元杨慎会在官场顺风顺水，最不济也可在翰林院做一个富贵闲人。但是造化弄人，他因议礼获罪被流放南荒35年，这使得杨慎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也改变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突然的变故让杨慎从云端落入凡间，有更多时间遍览名山大川和风土人情，有更多机缘接触各种阶层和现实人生。以上种种，使他反思和批判“德性之知”，并且更为关注见闻之知和多闻博见的重要性。

闻不若见 知不若行

——杨升庵的治学之道

□ 刘云超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是杨慎治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在治学还是生活中，杨慎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杨慎说：“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他在此把“善疑”视为学者在学术上成功之开始，而把不经思考而盲目信从视为一种学术视野的桎梏，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就治史而言，杨慎认为正史并非全部可信，必须经过考证。

一般而言，多疑者往往自大而偏执。杨慎虽然力倡善疑，反对迷信权威，却并没有走向偏执和极端怀疑，那是因为杨慎之怀疑精神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并非为怀疑而怀疑。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怀疑精神，恰恰让杨慎走向客观、公允和包容。例如杨慎主张诗赋要艳丽，文章要华美，极力反对理学家们所创作的所谓哲理诗或者理气诗。他批评陈白沙的理气诗“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但是他对于陈白沙的古诗却大加赞赏，认为境界冲淡，有陶靖节遗

意。他对李梦阳、何景明等当时文坛领袖的评价也大抵如此，有褒有贬，持论公允，绝不因其所短而忽视其所长。

杨慎独立思考的精神，除了源于天性与家世传统之外，与其见识广博也密切相关。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识越广就越不会夜郎自大，亦不会坐井观天。比如殷商始祖契诞生的历史，历代史书都遵循这样一个传说，契之母简狄吞玄鸟卵，孕而生契。杨慎则以他渊博的学识揭开该传说的神秘面纱，给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根据《礼记·月令》，“玄鸟至”乃春分初候，此日，天子以太牢祠于高禘而求子。所谓玄鸟生商，应该是说简狄在此时按照习俗求子并且验而有孕，而商人对此进行神化，以之类论证殷商有天命福佑。诸如此类因学问渊博而得出的精妙审慎之结论，在杨慎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求异求新，应时适变

针对当时文章繁冗拖沓、陈陈相

因的弊病，杨慎提出辞尚简要，文欲求新。他说诗文的内容和形式都要随时代而变，“盖不变则不新，不新则不奇”。杨慎由此进一步提出“同能不如独胜”，认为文学、艺术创作不能盲目效仿前人，应该不断创新，创作出不同流俗的优秀作品。“至音不合众听”“至宝不同众好”，别具一格、富于独创性的作品才能流芳百世。在这种观念引导下，杨慎本人在多个领域开一代风气之先。在哲学领域，杨慎提出“合性情说”，主张情欲应该得到合理满足，反对程朱理学“存理灭欲”之说。这在当时禁欲主义观念桎梏之下，起到了启迪和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的先声。在训诂章句领域，他反对空疏不学，主张探求古音本源，考订名物制度，下启乾嘉之学的兴起。在文学领域上，他批判前七子“宗唐法杜”的复古主义，带来晚明文艺思想的活跃。他的理论和创作引起明代诗风的转变，杨慎的《廿一史弹词》孕育了一种新的文体，开启一代新声，为近世弹词滥觞，在史学和文学上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

崇实黜虚，力倡实学

崇实黜虚，力倡实学，也是杨慎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明代中叶内忧外患不断，社会危机日益加剧。面对时代的呼声，程朱理学无法回应之，而其后继起的陆王心学过于强调“发明本心”，反而加重了社会矛盾。杨慎认为这都是“道学”徒务空疏所致，他指出陆王之弊在于趋简凭虚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子之弊在于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杨慎所主张的崇实黜虚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做学问要求真求实，批判客观公正。比如他在思泉上猛烈批朱熹和王阳明，却对朱熹治学之严谨精神非常赞赏，也赞扬王阳明对王导的评价。他平生大骂王安石，认为是“古今第一小人”，“王安石误国极矣”，但是他高度评价王安石文章之妙。这都说明他始终坚持客观求实精神，不因个人好恶而臧否人物。二是做学问要学以致用，要关注自然科学。杨慎对天文、地理、音律、生物、气候、医学等都有广博知识。比如他写过《滇候记》，记录了云南与内地气候之不同，他搜集记录大量古代农谚和各地农谚，说明气候和农业之关系。杨慎对一些动植物也做过详细考察，他考证棉花在梁武帝时“江南多冇之”，而不是元代才传入中国。求实的治学之道与他博闻多见和应时适变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见识广博自然能看到时代的弊端与需求，也正是因为能把握时代脉搏，力求日新，他才看到当时社会虚浮不实的弊端，也看到学界游谈无根之弊端。他由此提出对症的药，就是提倡实学。